

梅墟掏古

□胡白水

梅墟是过去鄞县靠近镇海县界的一个古镇,自幼即有耳闻,但每每路过,都未拐进去看看。前年十月,三官堂大桥竣工通车。十二月,我骑自行车过桥跨江,再沿江塘东行不远,终于来到了梅墟。

兴冲冲地来到梅墟,映入眼帘的却是梅墟拆迁中的一片废墟。既然无缘领略老梅墟的近形风貌,那只能搜肠刮肚、翻箱倒柜地说说它那过去的事儿。

一、梅墟之名

梅墟之名曾有三种说法。第一种说法是,天一阁创建者范钦,在明万历十三年(1585)撰写的《重修梅墟江塘记》中,有“环鄞东三十里而遥有墟焉,汉南昌尉梅福所栖迟也,因名梅墟”一句,说是该地因梅福居住而名梅墟。第二种是乾隆《镇海县志》引用嘉靖《宁波府志》的说法:世传大梅山有梅甚巨,称梅龙,孙权伐而三之,一登会稽禹庙之梁,一障鄞江它山堰,一飞入定海江中,横亘成墟,故名“梅墟”。这里的“定海”,即为镇海古称;“定海江”,应为甬江的“定海段”。这种说法之意是因梅山梅树而名梅墟。第三种是由宁波城厢人徐兆畧完成于清道光八年(1828)的《四明谈助》中的说法,此书在认同第二种说法的同时,又补充了“大梅山者,汉梅子真旧隐处也”一句。这便是综合了上述两种的说法,似乎梅墟之名,是因“梅人梅山梅树”而成。

在这些说法中,第二第三种说法掺杂了太多的人为想象,虽然得到了府、县官志和民间人文地理志的引用和附和,却不如第一种说法来得简明、务实和可信。

梅福,字子真,是生活于西汉与东汉交替之间的九江寿春人。在他任职南昌尉时,便上书天子,务请预防王莽篡位。因此言未被采纳,而又不幸言中,梅子真只得弃官离家,浪迹鄞东隐居。《汉书》等史籍,都记下了这位既有敏锐的政治远见又敢净言直谏之士的名字和事迹。

梅墟人对这位鼻祖式的人物,更有深厚的感情和特殊的纪念方式。根据《四明谈助》和《东井文抄·梅墟庙碑记》的记载,他们分别建起梅墟庙和小梅庙,供奉祭祀梅子真。其中,小梅庙在宋朝时,迁到了善庆桥边上,并改名为“大新”,于是便有了袁陶轩的“善庆桥边大新庙”的诗句。《四明谈助》还接着说:“今里人仍祀子真”,这样说来梅墟人纪念梅子真约有千年光景了。

二、梅墟之塘

梅墟位于甬江中段的南岸。自西东流的甬江,经过三官堂后突然在那里来了个大转弯,形成了一个岬。在乾隆《镇海县志》中说,岬中“潮流猛急”,因此称这段甬江为“岬猛江”。岬猛江江面宽阔,江水湍急,常给梅墟带来潮淹之灾,因此建筑江塘便成了梅墟人的生存大事。

梅墟很早以前曾筑有土塘,在明天顺七年(1463)前后,在时任浙江按察司副使、巡督海道朱绅的发起和乡老钱方伯(璉)的捐资下,于成化五年(1469)至七年间,把原

有的土塘,改建成了长为二百八十丈的石塘。据《四明谈助》介绍,石塘建成后“被其利者三邑七乡,民称曰‘钱公塘’”。

“钱公塘”到了明万历初年,已是“岁久而圯,圯则溃决”了。于是,在万历九年(1581),由宪副冯时雨、大尹杨芳及钱方伯后裔庠生钱子江,委托邑主簿孙公春具体负责重修梅墟石塘。孙主簿确实是个实干的能人,他“量日命工,不愆于素,凡阅月而告成焉”。

梅墟石塘重修后,又及时做了两件事。一件是请致仕归乡的范钦撰写《重修梅墟江塘记》,并刻石竖碑,作为永久纪念。光绪《鄞县志》收录了这篇碑文,但与收藏于天一阁的碑文拓片校对,却是错误百出。另一件事,就是在碑文中写到的:“塘之上,结茅为庵,命庵僧圆琮恪共其事,仍拨闲旷涂荡三亩,令其开垦成熟,将所收花利,贍其时常补修之费。”把守护和维修石塘所必须的人、财、物落到了实处。

梅墟石塘到了清乾隆年间,也已千疮百孔了。于是,在乾隆二年(1737),又对它来了一次大修。这次大修,意义非凡,不但记入了《鄞县志》,而且载入了《宁波通史·清代卷》。

据1996年版的《鄞县志》记载,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鄞县的甬江江塘共长8.98公里,只有梅墟段为石塘,其余乃为土塘。这首先要归功于“钱公塘”,它历经四百多年而依然领先,真是不简单。

三、梅墟之硬

梅墟的江塘筑起来了,这固然可以抵挡住海潮的涌入,保证了居民生活和农业生产的安全,那么如何来蓄水排涝泄洪、进一步改善乡民们的生活和生产环境呢?为此,历年来梅墟进行了一系列水利工程建设,而且规模、等级逐渐上升。

根据1996年版《鄞县志》的记载,在清乾隆五十年(1785),筑起了梅墟堰;1924年,由乡绅戚森卿捐资,筑起了梅墟涵闸;1926年,人们在梅墟的界牌河上建起了界牌硬;1952年,政府对这座界牌硬进行了重建,使它一直运行到上世纪九十年代。在流经梅墟的潭头河上,先在1958年,建起了两孔钢筋混凝土梁板式闸门,又在1964年改造扩建成七孔闸门,故名此闸为“七洞闸”。1966年,在另一条流经梅墟的后塘河支流上,又建成了一座五孔钢筋混凝土梁板式闸门的梅墟硬。

从三官堂大桥至梅墟的这段并不长的江塘上,依次有“鄞东南排涝闸”、“甬新闸泵”和“鄞县邱隘区高产硬”这三座水利工程。前两者是近年建造的现代化大型水利工程,在现场都有较为详细的文字介绍,让人看了觉得清清楚楚。至于那座梅墟边上直接通向甬江的高产硬,从那颇有传统书法功底的“鄞县邱隘区高产硬”横额落款时间来看,此硬应建于1967年。高产硬虽然历经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侵蚀,已显得斑驳苍老,却仍不失粗壮结实,至今还在发挥它那不可替代的水利功能,与它背后已是一片破碎瓦砾堆的老梅墟,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但是,除目睹了高产硬的这些实物外形之外,对它的基本情况却是不甚了解。在它周围既未找到文字说明之类的标牌可供阅读,也未碰到一位对它稍有了解的本地人可以请教,在手头上现有的资料中也未找到对它只有只言片语的介绍和记载,这实在让人有点郁闷。然而,不管怎样,这座名不见经传却实实在在屹立着的高产硬,与上述这些水利工程一样,都为梅墟阻咸蓄淡、排涝泄洪发挥过或正在发挥着自身的作用。默默无闻决非窝囊无能。

四、梅墟之渡

作为甬江边上的梅墟,在甬江上设置一个梅墟渡,便与江北镇海县相交往,那是

再正常不过的事。但是,不正常的却是在乾隆《镇海县志》中出现了“梅墟渡”在“东管三都”的记载。这“东管三都”是当时镇海县东管乡的属地,怎么会有鄞县的梅墟渡呢?带着这个疑问,又查阅了《宁波市镇海区地名志》,结果是没有查到“梅墟渡”,却碰到了“外夏渡”。该志解释外夏渡说:“位于庄市街道甬江村慧济庵前200米处,亦称梅墟渡,达甬江南岸原鄞县梅墟渡。”可能当时梅墟渡的名气盖过了与之对应的镇海外夏渡,因而人们习惯性地就把外夏渡也称之为梅墟渡,以至影响到了县志的记载。

这个名气颇大的梅墟渡,在1996年版的《鄞县志》中,却找不到对它的记载,无奈之下,只能通过对外夏渡的介绍,来侧面了解一点梅墟渡的大概情况。

概括乾隆《镇海县志》和《宁波市镇海区地名志》对外夏渡的一些零星记载,可以知道外夏渡始建于清康熙年间,当时那段江面宽有500多米。开始是由乡人金英与庠生陈帝胤、汤尔昭共同创建的义渡,并捐置祀田,以资义渡费用。此事深得民心,也惊动了官署,于是又增添了三只官船和十亩田为渡费。在清康熙五十四年(1715),邑令陆敬德还在渡头、庵门立了书刻着《公置贍田亩分土名字号》的牌子,这块牌子到了纂修乾隆《镇海县志》的乾隆十七年(1752)时还存在。渡口在清中叶建了一座“外夏凉亭”,后来又在埠头筑起了一条长130米的路桥,再后来又置有一艘4吨木质机动渡船,最后于2000年前后停航,改由391路公交车自甬江村至梅墟。

五、梅墟之市

相比之下,梅墟市的形成是比较晚的。《宁波通史·清代卷》在对鄞县从明天顺六年(1462)到清康熙二十二年(1683)的集市统计表中,没有找到梅墟市,而在乾隆《镇海县志》中才看见有“梅墟市:崇邱一都,镇鄞交界”的简单记载。由此可以确定,梅墟市的形成,大约在清康熙中期至乾隆前期这个时间段之内。

古代中国是个农业社会,十分重视事关农业命脉的塘、堰、硬、闸等水利设施的建设;由农业社会孕育生长出来的农业经济,也催促着辅路、搭桥、置渡、建亭、设街集市等交通和贸易设施的完备。这些设施的建造及投用,也客观地反映或标志着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程度和水平,尤其在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更为典型。

梅墟的集市虽然形成得比较晚,但从梅墟的建塘、集市、筑硬、置渡等标志性建筑的时间顺序来看,也显示出生活于古代农业社会的梅墟人,先是要围起江塘,营造出一个相对安定的居民生活和农业生产的环境后,才能去从事农贸经济活动,使其周边形成农贸市场;而随着农贸经济活动的开展和发达,又进一步促进和改善自己的生活和生产环境,建造起堰、硬、渡、街等水利、交通及贸易设施。如此往复循环,不断地推动着社会和经济的进步及自身的提高。

梅墟也的确是到了清康熙时期才开始了较大的发展。在清初的乾隆年间,梅墟是隶属老界乡赤城里四都。这四都又分为七图,而梅墟的地域则自东面的梅墟街开始,向西横跨了三图、四图和五图。那时,梅墟已有名气响亮的梅墟街和范围广阔的梅墟地段,这在同时期的其他乡里是极少见的。在清朝末年的宣统三年(1911),将原老界乡紧挨甬江边的一都和四都单独设置为盐梅乡,原为梅墟里的“梅”,则成了盐梅乡名的组成部分,显示出梅墟在乡里已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在民国前期的1935年,梅墟由里升为镇,是当时鄞县88个乡镇之一,辖管17个村落。到了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,鄞县按照省政府的决定,拆并乡镇成48个,梅墟由镇改乡,成为梅墟乡。